

# 新詩寫作坊

日期：2011年4月16日（星期六）上午10時30分

地點：香港城市大學康樂樓5樓R5004室

主持：廖偉棠先生

## 廖偉棠：

大家都覺得新詩很難明白，但假如讀到一篇好詩，我們的心靈會被觸動。這種觸動，很難用邏輯的、清晰的語言去表達。究竟詩是甚麼？今天我選了一篇博爾克斯寫的詩《南光》來解釋甚麼是詩。博爾克斯是阿根廷人，他是位盲人，但也是讀書狂，他最悲劇的事情見於三十歲時寫的一首詩：「上帝同時獻給了我一座圖書館，和一片黑暗」。三十歲時，他被任命為亞根廷首都圖書館館長，因為他學識淵博，又是著名作家，但與此同時，他雙目失明了。

博爾克斯卻因雙目失明而變得記憶力特強。三十歲前看過的書本和一切，他全部記在心裡。在《南光》裡，他寫他知道星星存在，但因為看不到，所以不能把星星排成星座，但接下來他寫道：「已感到水的迴旋在隱蔽的水池」。他聽到水的聲音在水池裡轉。他又「感到淚和酒精的香味」，因為嗅覺令他嗅到花的香氣。「沉睡的鳥兒的寧靜」，鳥兒的叫聲慢慢消失，所以他聽到鳥兒的寧靜。原來一個人失去視覺，反而令其他感觀更靈敏。他又寫道：「這些事物也許就是詩」。有些東西雖然看不見，但卻可感到它的美和存在。

## 先學做人，再學做詩人

---

詩歌能令人產生聯想。好的詩只寫十分之一，便可令人聯想到十分之十。寫好詩是有步驟的：先學做人，再學做詩人。真正成熟的詩人，

有一種包容世界的胸襟。當然也有病態卻很有才華的詩人，例如顧城。顧城很孩子氣，很天真，這對寫詩來說是好處，但對做人卻是壞處。他因為接受不了太太要離開他而殺死她，隨後自殺。

我們絕大多數人學造詩、學讀詩，並不是為了將來成為詩人，而是要令自己有一個詩人的心。詩人的心不是很浪漫、很多愁善感的那種。詩人的心，意味著他比其他人對世界萬物的美更為敏感，同時對世界萬物的醜惡比其他人更為憤怒。學寫詩，其實就是學習詩人面對世界的態度。

在這裡我要說說哲古華拉的故事。他是古巴革命成功的關鍵人物，也是個很喜歡看詩的人。他打游擊時，背包裡除了槍和彈藥外，還有一本聶魯達的詩集。他是一個戰士，但他的行為比更多詩人更詩人。古巴宣布獨立後，他做了幾年官，但覺得這不是他想做的事，於是他辭去所有職務，並且找了幾個當年跟他出生入死的人，一起到岡果和波利維亞打游擊戰。他的結局很悲慘，1967年，他被美國特種部隊包圍並殺掉。但他的事跡，體現著理想主義的詩意。理想主義的詩意和詩人韓波的一句話十分相似：「我想成為任何地方的任何人」。

## 歌頌和介入現實的詩

---

接下來，我要談談兩個關於詩的特例，就是歌頌的詩和介入現實的詩，兩者之間存在著相輔相成的關係。許多人初次寫詩時，會誤以為是在逃避現實，以為詩人可以把自己藏在詩中之美而忽略周邊的現實。但事實並非如此。

我想介紹一首黃燦然寫的詩《母親》。黃燦然是中年香港詩人。他十五歲來港，到工廠打工，有了積蓄後，回到廣州暨南大學讀新聞系。後來他到香港《大公報》國際新聞部當翻譯。國際新聞翻譯是一種很高要求的翻譯工作，要在很短時間內把外電譯出。可能有人會想，一個詩人怎可能從事如此枯燥、殘酷的工作？大多數人可能以為詩人必然是

老師、自由寫作人，或者從事很浪漫的工作，但黃燦然卻不這樣想，他把自己的身份變得很獨立。而且這份工作給他一個體會，就是和其他正常上班時間的人不一樣，他是晝伏夜出的人。

這一首詩便是寫他下班乘小巴：「在凌晨的小巴上，我坐在一位五十來歲的女人身邊，她略仰著臉，靠著椅背，睡得正甜。她應該是個做夜班的女工，家裡也許有一個正在讀大學或高中的兒子：瞧她體格健壯，神態安詳，看上去生活艱苦但艱苦得有價值，而且有餘裕。我的靈魂一會兒凝視她的睫毛，一會兒貼著她的臂膀，一會兒觸摸她的鼻息。啊，她就是我的勤勞的母親，這就是母親二十年前做製衣廠女工下班坐巴士回家的樣子，而我直到此刻才被賜予這個機會看到。我靜靜坐在她身邊，我的靈魂輕輕地把一塊毛毯蓋在她身上。」

這是一首非常感人的詩。黃燦然從小巴上的女工聯想起了二十年前媽媽的形象，於是他的思維穿越時空，靈魂回到了二十年前，為母親蓋上毛毯，成為了遲來的安慰。這種安慰在現實上是不可行的，首先他絕不能夠觸碰那個坐在小巴的女人，但在想像之中，他完成了這個儀式，償還了對過去的母親的愛意。由現實進入了超現實，這超現實的舉動償還了他對母親的愧疚，同時亦完成了他自己和母親之間的和解。

## 浴室裡的幽閉

---

另一首我要介紹的詩是我所寫的組詩《不存在的女人》的其中一首。二零零八年我參與了出版《是她也是你和我——香港准來港女性口述歷史》，「准來港女性」就是和港人結了婚但還沒取得身份證的人，這批人比新移民更慘。大概在零七年，屯門寶田中轉屋發生了一件慘案。阿幸的丈夫懷疑她有外遇，乘她入睡時，用燒熱的水倒在她身上。她丈夫以為成功殺死了太太，便喝鏟水自殺。最後阿幸沒死，但

警察卻認為是阿幸殺了丈夫。阿幸遭毀了容，在送院中途被轉送羈留所，羈留了接近四個月後，才被證明無罪，得到釋放。

在我採訪的過程中，我把大量細節記下，寫進詩中。「公共汽車緩緩駛近山邊 / 屯門區的邊緣，數棟臨時安置公屋 / 與一個簡陋的市場相依為命。 / 這裡常常成為報紙的頭條，恐怖或者悲傷。 // 這些頭條的主人翁原來就生活在這， / 白熾的陽光順著山腳的芭蕉滾流， / 嚴令禁止晾衣的鐵絲網上還是掛滿了衣服， / 孕婦推著嬰兒車，哼著搖籃曲，恍惚微笑。 // 我無法想像你在八尺浴室裡的幽閉， / 無法想像他們說的：「如果你是孕婦 / 你恐怕不能轉身。」我無法為你回憶最後一餐 / 他買回來、比平日稍稍豐盛的飯菜。 // 這一切都在最後一夜被押走， / 包括為了省電，被刻意調暗的燈光。 / 沒有殺人，荊棘拿在手上，手還是不能換的， / 孩子們跑過停車場，公共汽車又駛進—— // 一堆遠離大都會的水泥板塊 / 被用作中轉地，已經被車輪和砂石磨花。 / 死生本來是契闊，現在卻因貼得太緊而融合， / 它吞掉你的容顏、你生活卑微的憑證。 // 如今你不需要憑證了，只撇下黑暗中的寶田， / 我在那裡走過來走過去，小心地告訴每片樹葉，旁人並不理解的： / 陽光，曾是理所當然。」

詩中細節，如八呎浴室裡的幽閉，是受訪者跟我說的。「比平日稍稍豐盛的飯菜」則是阿幸說的，她說事前沒想她丈夫會殺她，那天丈夫買來很多菜，原來是想做最後晚餐。

最後我要談的是介入現實的詩歌。介入現實的詩，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。近年來最常提及的便是「八十後」、「九十後」，是近來香港社會一個很重要的力量。據我觀察，二零零五年的「反WTO行動」今年輕人有明顯的轉變，他們學懂了快樂抗爭。隨後的天星碼頭、皇后碼頭、利東街的保育運動、反高鐵示威的表達形式均趨激進、人數幾何級數地跳升，與過往傳統有根本性的分別。

每次社運我都參與其中，把所見所感寫進詩裡。比較有趣的例子是利

東街，又名喜帖街。利東街本來有許多印喜帖的公司，舊一輩人都會在這裡印喜帖，但一夜之間香港政府把利東街整條圍上圍板。「唐樓已被封鎖，只剩一片天，如一條蜈蚣爬過我們的頭頂，貪婪地舔著利東街的兩岸，兩岸是鐵甲、是麻、是所有的烏雲中的石頭剪紙布和地價的紙碎，灣仔死了。」

你或會問，為甚麼要創作新詩？因為新詩讓我們建立一個屬於我們的詩歌世界，讓我們建立領悟這個世界的能力。